

贝科夫小说选



当代外国文学

贝科夫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龙

贝科夫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7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1}{2}$

1980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

书号 10208·2

定价 1.05 元

目 录

方尖碑.....	1
活到黎明	97
狼 群	283

方 尖 碑

吉林大学外文系俄文教研室
文学翻译小组译

ВАСИЛЬ БЫКОВ

«ОБЕЛИСК»

据《РОМАН-ГАЗЕТА》1973. № 24 译出

在整整的两年里，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到离城不很远的那所村学去一趟。多次想去，但每次都往后拖。冬天，想拖到寒潮稍退或在暴风雪停息以后；春天，又想等干燥暖和一些；到了夏天，路也干了，天也暖和了，又一心忙着去那拥挤、炎热、人口稠密的南方度个把月的假期。另外，也曾想过：还是等工作和各种家务闲一些再去。正象生活里常有的那样，我一拖再拖，以致来不及去做客，只有去参加葬礼了。

关于葬礼这件事我知道得也晚。我出外办事回来，在街上遇到了一个熟悉的老同事，我们随便讲了几句话，开了几句玩笑，都要分手了，他忽然象想起了什么，又站住了。

“听说了吗？米克拉谢维奇死了，就是谢尔佐村的那位教师。”

“怎么——死了？”

“可不，就这么死了。前天死的，好象在今天安葬。”

这个同志说完就走了。米克拉谢维奇的死，他大概无所谓，可我心慌意乱地站在那里望着街。有那么一刹那，我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忘了自己所有急需办的事。一种

还没有意识到的内疚猛地一下把我击懵了，象把我钉在这块柏油马路上。当然我也知道，若论这位年青乡村教师的早死，我是毫无过错的，而且他既不是我的亲戚，甚至也不是我亲近的朋友。但我还是感到一阵心痛：一来出于对他的惋惜，二来这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一个无法弥补的过失：有一件事我过去没有做，现在是永远也无法去做了！我觉得不应该放过最后这一次求得自我原谅的机会，所以当机立断：现在马上到谢尔佐去。

从我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刹那起，就感到时间过得飞快，无法按常规去计算。更确切点说，已经不知道时间是怎样过去的。我拚命忙合起来，虽说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回到家，家里人都不在，连一张告诉他们我外出的便条都没有写，就向汽车站跑去。又想起了机关里的工作，想打个电话，但自动电话机仿佛故意跟我作对似的。它正常无误地吞着硬币，却象中了邪似的成了哑巴。我跑去找别的自动电话机；只是在新建大楼“食品商店”才找到，但已经有一队人耐心地排在那里。我等了好几分钟，听完打碎了玻璃的蓝色电话亭里那些冗长琐碎的通话；还和一个原先被我当成姑娘的小伙子吵了一架——他穿着喇叭裤，亚麻色的绉绉鬈发一直拖到绒布短上衣的领子上。等到我终于打通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却错过了去谢尔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今天看来不会再有去这个方向的车了。我想在停车场强乘出租汽车，但白白浪费了半个来小时。开过来的每一辆车，都有一群比我动作灵、主要是比我脸皮厚的人冲上

去。最后，我只好想法来到城外的公路上，采用了在这种情况下行之有效的老办法——截车。果然，从城里开来的第七辆或许是第十辆满载一卷卷油毡纸的汽车在路边停住了，让我和一个小伙子上了车，他穿着胶底运动鞋，挎包里鼓鼓囊囊装满市里出的一个个大面包。

坐上车，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只是有时候觉得汽车走得太慢，甚至我发觉自己在心里骂司机；虽然冷静一点想，我们这趟车开得很正常，和别的车没有两样。铺着沥青的公路，平坦又几乎笔直，汽车只是在上下慢坡时轻轻摇晃。时近黄昏，晴朗的仲秋季节，远方宁静清爽，一片片幼林浅黄稀疏，空旷的田野辽阔无际。离公路不远，靠树林附近，集体农庄的牛群在那里放牧——几百头不满周岁的牛犊，一样的年龄和个头，一样的棕红毛色。在公路另一侧的宽阔田野里，集体农庄一台不知疲倦的拖拉机嘟嘟地在秋耕。几辆满载亚麻秆的汽车向我们迎面驶来。公路经过的布基洛维奇村庄，那住房前的晚季天竺牡丹红花似火，艳丽夺目，菜园里犁开的垅沟边，倒伏着干枯的茎叶，农妇们正在那里翻捡土豆。大自然充满宁静的秋光。庄稼已经成熟收割，大部分农活已经做完，只剩下粮食的加工和冬藏了。在这个时候，人类恬静的喜悦流露在古往今来、代代繁忙、节奏和谐的农活之中。明年春天再见吧，多辛多劳的田野！

但是大自然的柔情美意却怎么也没能给我安慰，而只是使我感到压抑和恼怒。我来晚了，确实晚了，我感到痛苦，悔恨自己懒惰成性和麻木不仁。以前的种种理由此刻

全都变得没有根据，其实我又何曾有过什么理由？要是这样懒散迟钝下去，就很容易虚度年华，了此一生，在这罪恶的人间没有做出任何一件或可使你生命具有意义的事来。如果为了虚无飘渺贪得无厌的幸福象蝼蚁一样忙忙碌碌，而将重要得多的东西弃之不顾，那就让这种无聊的生活见鬼去吧！因为这会把你的生活阉割得毫无意义。你的生活只是你自己才认为是自立的、与别人生活隔绝的、按你纯个人的生活轨道安排的。事实上，如果人的生命还充满着某种有意义的东西（这并非今天的发现），那么这首先就是人类的合乎理性的善良和对别人的关怀——关怀那些与你亲近甚至和你疏远但是需要你关怀的人们。

也许米克拉谢维奇比别人更懂得这个道理。

其实，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文化水平也不是出奇的高，也没有受过足以使他出类拔萃的高级教育。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也许既不高于也不低于成千上万的其他城乡教师。不错，我听说过，他在战争期间有过一段悲惨的遭遇，甚至是死里逃生。还听说他身患重病。任何人第一次见了，就能发现，他是重病缠身。但我从未听见他抱怨过，或者让人知道他是多么的痛苦。记得我们在一次教师代表会休息时相识的情景。当时他正在市文化宫喧哗的前厅靠窗站着和一个人谈话。他骨瘦如柴，两肩高耸，背上的两个肩胛骨在西装上衣底下鼓出来，加上细长的脖子，他的身材从背面望去，显得特别脆弱，几乎象个孩子。突然他把那张苍老疲倦、皱纹密布的脸转向了我，我的印象

立即改变，感到这是个受够了生活折磨的小老头。其实呢，我准确知道，当时他才三十四岁。

“听说过您了，早就有件疑难事想求您，”米克拉谢维奇当时说话的声音有点喑哑。

他吸着烟，把烟灰弹落在手指捏着的空火柴盒里。记得，当我看到他那皱皱巴巴的焦黄的手指在神经质地颤抖，不禁吓了一跳。我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把视线很快移到他的脸上：脸有倦色，但惊人的安详和开朗。

“报刊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他半开玩笑、又若有所指地引用了这句话。从他脸上网一样的皱纹后面露出来一丝善意的微笑，伴着痛苦的哀愁。

我知道他在格罗德诺地区游击战争史里查找什么。他本人还在少年时就参加过游击队的活动。四二年，他的几个好同学被德国人杀害了。米克拉谢维奇张罗着给他们在谢尔佐立了一个不大的碑。原来他还有件什么事指望我帮忙。那还用说，我是愿意帮忙的。我答应上这儿来谈一谈，如果真是疑难的话，尽可能把它搞清楚。在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解决各种疑难复杂问题的兴趣。

可现在，我来晚了。

公路靠着小树林缓缓地拐了一个大弯，松树的华盖耸立在公路上空。拐过弯，谢尔佐终于出现在眼前。这里曾经是地主庄园，几十年的老榆树和老椴树，枝繁叶茂，亭亭如盖。一幢独门独院的老式楼房——现在的学校，隐匿其中。汽车不慌不忙地驶近通往庄园的路口。我就要到了！

随着汽车的驶近，我心潮翻滚，重又沉浸在悲哀和痛苦之中。顿时产生了何必来的念头。我何必来这里参加这令人伤心的葬礼？本应该在以前来啊！现在谁还用得着我呢？而且这里又有什么是我所需要的呢？但是现在这样考虑问题看来已经没有用了，汽车开始放慢了速度。我叫了一声同路的小伙子，要他敲敲驾驶室，从他安静的神情看得出，他还要坐车往前走。我踩着一卷卷粗糙的油毡纸挪到了车帮，准备往路边跳。

我就是这样到了！汽车生气似地从排气管里喷出一股气，又继续往前开动了。我在公路边走了不多远，也顺便活动活动麻木的双腿。我在公共汽车的窗口不止一次看到过的这个熟悉的叉路口，以其抑郁的殡葬气氛迎接我。横跨沟渠的小桥旁边竖着一根柱子，挂一块公共汽车站牌，柱子后面可以看到熟悉的方尖碑，一块黑牌上刻着五个少年的名字。距公路百步远的地方，挨着大道有一条古老狭窄的林荫小道通往学校，两旁粗壮的榆树东倒西歪。在林荫道那一头的校园里停着一辆“嘎斯”车，还有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一看便知是区委会的）在等候谁，但那里见不到一个人。我想，“人们现在也许上别处去了。”但我甚至连公墓的地点也弄不大清楚。要是真还有什么必要去，也不知往哪儿走。

就这样我犹犹豫豫地走进了树冠重叠浓荫蔽日的林荫道。大约五年前我就来过这里。那时这古老的地主大院，还有这林荫小道，并不显得这样死气沉沉。当时正是课间休息，校园里到处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而现在，四周鸦雀

无声，被不祥的殡葬气氛所笼罩，甚至连老榆树稀稀落落的黄叶也不再发出簌簌的声响，蛰伏在傍晚的静谧之中。沿着这平坦的砾石小道，很快就来到了校园。面前耸立着一座宫殿，有上下两层，可见当年也曾富丽堂皇过一个时候，不过现在已经破旧凄凉了，正面的宫墙都有了道道裂缝。这老式宫殿的外廊有雕花栏杆，大门两侧立着白色圆柱，还有那威尼斯式的高大窗户。我需要打听一下米克拉谢维奇在什么地方安葬，但是又没有人可以问。我不知去哪里好，茫然若失地在汽车旁边徘徊了一阵，甚至都想进学校了，突然另外一辆满是灰尘的“嘎斯”车从林荫道里飞奔而出，差点没把我撞上。汽车猛地刹住了，从帆布车棚里钻出一个身穿皱皱巴巴的绿色尼龙雨衣的人。这人我认识，是州管理局调来的畜牧专家，听说，现在在区里一个什么地方工作。我们大概有五年没见面了，尽管是只有点头之交，但他在此时此刻出现，我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好！朋友，”——畜牧专家向我打招呼，他洋洋自得容光焕发的脸是那样兴致勃勃，仿佛我们不是来这里参加葬礼，而是来参加婚礼的。

“你也来了，啊？”

“嗯！”我有所克制地答了一声，他立刻接过我这种克制的语调，把声音压低了说：

“他们在教师楼那里。喂，来帮个忙吧。”

他抓住一个角，从汽车里拖出一箱“莫斯科”牌白酒，一排排的酒瓶在那里发亮，看来他是去村供销社或市里买酒

回来。我接住箱子的另一头，两个人抬着绕过学校，穿过花园里的树丛，沿小道朝附近那所住有教师的厢房走去。

“他怎么就死了呢？”我问道，对于这个人的早死我还是觉得突然。

“就这么死了呗！什么事不都这样突如其来！人活着活着，一下子就死了。”

“他死前至少生过一点病什么的？”

“病！他生了一辈子病了，但这人是真干。结果干过头了。既然有这样的机会，那就去喝上一通吧！”

开始显得稀疏的丁香丛中露出一簇簇鲜嫩多汁的山楂，红艳艳的。花丛后面是一所泥灰脱落的破旧厢房，听见里面有许多人在低声地谈话。据此可以推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仪式已经结束，葬礼后的筵席正在进行。厢房几个矮窗户敞开着，在向两侧拉开的窗帘中间，露出一个身穿白色尼龙衬衫的男人脊背，并排是高盘在一个女人头上的亚麻色浓发。两个没有刮脸的男子，身穿工作服，站在门廊旁边抽烟。他们三言两语地聊着天，然后默默地接过我们手里的箱子，抬进了屋。我们顺着狭窄的走廊，跟了进去。

一间不大的房子，能搬的东西现在全都搬出去了。几张桌子拼放在一起，上面摆着剩下的一点酒菜。席上的二十来个人已经在谈天和吸烟了，缕缕烟雾徐徐飘向窗外。从这种显然是不紧凑的场面可以看出，筵席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了。我也知道，我的迟到还不如不到，很容易受到非议的，但既然来了，当然不能拿起帽子就走。

“请坐，这里有地方。”一个头裹黑色三角巾的上年纪的妇女语气悲痛地请我入了座，她并没有问我是谁和做什么来了。大概象我这样来晚了的情况，他们这里并不觉得特殊。

我顺从地坐在高桌子旁边显得矮了一点的凳子上坐下来，想尽量不引起这些人对我的注意。但身边一个人已经向我转过脸来——一张浮肿苍老的脸庞全是汗水。

“来晚了？”他说得很随便，“有什么办法呢？再也见不到我们亲爱的保尔了，永远也见不到了。喝一杯吧，同志！”

他把一杯显然是谁喝剩的伏特加塞到我手里，杯上还留着别人的指印；他自己从桌上拿起了另外一个杯子。

“来，老弟，愿他安息！”

“好吧，愿他永远安息！”

我们干了杯，我用谁的叉子从盘里叉了一小片黄瓜，我这位邻座用不听使唤的手指从揉皱的“冠军”牌香烟盒里夹出了可能是最后一支烟。这时一个穿黑色连衣裙的妇女又新摆上了几瓶“莫斯科”白酒，几个男子把酒分斟到杯子里。

“静一静！同志们，请静一静！有人要讲话了。”这话声音很大，带着醉意，从贵宾席方向传来，盖过了嘈杂的人声。

“克辛德佐夫，区教育局局长，”我的邻座喷了一口浓烟，附在我耳边大声说，“他能说什么？他知道什么？”

在桌子的那一头，只见一个年青人从座位上站起来，那显得有点呆板固执的脸上露出做领导人惯有的自负。他举

起了一杯伏特加酒。

“关于我们亲爱的保尔·伊万诺维奇，大家都已经谈了。他是一个好党员，先进教师，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总的来说……一句话，他不应该死。”

“要不是战争，他就不会死，”一个女人很快地插了一句，想必是坐在克辛德佐夫旁边的那个身穿淡咖啡色高级短上衣的女教师。

教育局长讷讷地说不出话来，象是被这个插话弄糊涂了。他整了整胸前的领带，完全看得出，他做这方面的讲话有困难，不习惯，他搜索枯肠，但看来肚里根本找不出适合这种场合的词句。

“对，要不是战争，”这个演说家终于表示了同意，“要不是德国法西斯发动的、给我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战争。在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战争创伤已经医治，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已经恢复，苏联人民在各个经济部门，还有文化、科学、教育部门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在……”

“这和成就有什么相干！”突然有人在我耳边大吼了一声，桌上一个空瓶子往上一跳，随后就在盘子中间滚开了。“这和成就有什么相干？我们是来送葬的！”

教育局长不怀好意地把话打住。席上的人都开始紧张地、几乎是惊恐地朝我的邻座看过来。他那涨红的脸冒着虚汗，一双已经开始衰老的眼睛明显地充满着愤慨，一只静脉曲张的大拳头咄咄逼人地压在桌布上。

教育局长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带有

几分尊严地说话了，好像是训斥一个犯了纪律的小学生：“特卡丘克同志，放规矩点！”

“安静点，别说了！您怎么了？”坐在我邻座旁边的那个女人侧着身子对他关心地说。

但特卡丘克看来不愿意安静，他慢慢地从桌旁站起来，挺了挺那笨重的开始衰老的身子。

“你自己倒应该放规矩点！你干吗在这里扯什么成绩？为什么你不提莫洛兹？”

眼看这场架就要吵起来。我感到挨着他坐不那么得劲。好在我是局外人，也并不认为自己有权过问这件事——安慰谁或者支持谁。但是应该说，教育局长还是表现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应有的克制。

“莫洛兹和这毫不相干！”局长沉着而坚定地顶住了我邻座的进攻，“我们又不是为莫洛兹举行葬礼。”

“很相干！”特卡丘克几乎喊了起来，“有米克拉谢维奇这样的人，这要感谢莫洛兹！”

“米克拉谢维奇嘛，那又当别论了。”局长不再争辩了，他端起半杯酒，“干杯！同志们，为了悼念米克拉谢维奇！愿他的一生成为我们的榜样。”

席间开始了碰杯后常见的那种活跃空气。大家都干了杯，只有脸色阴沉的特卡丘克示威似地将身子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

“对不起，我来不及拿他当榜样了，可以告诉你们，他过去是拿我做榜样的。”他气势汹汹地说，说时没有对着谁，